

# 袁桷及其藏書始末探論\*

陳煒舜\*\*

佛光大學文學系

## 摘 要

元代國祚不及百年，其私人藏書之情況，學者研究較少。袁桷乃南宋世家之後，廣蓄書卷，且編有《袁氏新、舊書目》。然因藏書在其身後漸次散逸，兼以書目不傳，藏書情形已難全面了解。本文以袁桷所著《清容居士集》為中心，結合《延祐四明志》及他書的相關內容，簡介袁桷的生平著作及學術思想，管窺其文獻學內涵，並探析其藏書始末，以見元人藏書實況。袁桷於史學考據訓練有素，於理學主張會同朱陸，詩風尚三唐，開元人宗唐之風。好目錄學，精於賞鑑考據，少時便曾分集宋史資料。袁桷曾祖袁韶即好聚書，數世以來，典藏豐富。其家書籍之來源，不外手自抄寫、採購、餽贈三途。袁家世仕南宋，宋史資料甚饒。袁桷藏書頗有珍品，如陸淳《春秋纂例》乃寶章桂氏精校本，李後主詩乃作者手稿，王應麟《困學紀聞》、戴表元文集、黃震《日抄》、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等稿本、鈔本當亦在其所。袁氏藏書於袁桷去世後尚由其孫袁曦保存，元惠宗至正初年，曾捐書數千卷以資宋史館修史。至元代末年，兵荒馬亂，袁氏家族衰落，子孫黯弱，藏書多為婢妾所毀、僕幹所竊，終至所存無幾。自南宋中葉至元代覆亡，袁氏藏書巋然東南百有餘年，時越兩朝，人更六代，故元末孔齊謂袁氏藏書「國朝以來，甲於浙東」。欲考有元一代私人藏書之風，袁桷典藏可謂知味一嚮。

**關鍵詞：**袁桷，藏書，元代文化，文獻學，浙江

---

\* 本文初稿宣讀於「甬宋樓暨江南藏書文化國際研討會」（湖州師範學院、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主辦，2007年10月，湖州），經兩位匿名審查者給予寶貴意見，啓我良多，敬表謝忱。

\*\* 本文作者電子郵件信箱：kolyushka@yahoo.com。

## 一、引言

清末葉昌熾《藏書紀事詩》一書，共收錄五代至清末藏書家一千一百餘人，其中元人僅有元好問、趙孟頫、莊肅、張燾、袁易、袁桷、陸友仁、蘇天爵、張貞毅、倪瓚、孫道明、夏庭芝、陳季模以及吳郡陸氏、景春沈氏、蜀帥紐鄰之孫等，十五、六家而已。<sup>(註1)</sup>然鄧洪波論元代書院藏書云：「元代書院的藏書事業之所以繼續向前發展，除了漢族士人爲保存固有文化的刻意追求、不懈努力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蒙古等少數民族中有識之士對於藏書建設的重視。」<sup>(註2)</sup>元代書院藏書之風如此，私人藏書實亦不遑多讓。據方建新統計，元代有明確記載、生平事蹟可考、藏書數千卷以上的藏書家有一百二十七人。<sup>(註3)</sup>元代藏書家的人數，上較趙宋、下視朱明，固有愧惡。究其緣由，蓋因元代享國不及百年、且科舉久廢之故。而汪辟疆《目錄學研究》論云：

元世諸藏書家著錄，傳記罕載……有無目錄，更無從論定矣。<sup>(註4)</sup>

葉昌熾於元代藏書家收錄偏少，文獻散失無徵係一重要因素。而另一方面，元代又是刻書的興盛期。汪氏又道：

元起朔漠，文事未遑。雖亦有經籍所、宏文院、秘書監之設，又盡收臨安圖書，海運北上，而目錄之作闕如。至正中儒臣撰《秘書監志》，亦僅紀先後送庫若干部若干冊，而不列書名。明初修《元史》，又不列藝文一科；一代祕閣所儲，漫無稽考。但自五代以來，印板大行，至兩宋則益精。而公私版本，流布海內，自國子監、祕閣刊校外，尚有浙本、蜀本、閩本、江西本，此外則學官詳校，或書坊私刊，後世目錄家之專事賞鑑者，插架相誇，罔不取給於是。此則宋元兩朝之所獨絕者也。<sup>(註5)</sup>

1. 葉昌熾，《藏書紀事詩（附補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初版），頁78-94。

2. 鄧洪波，〈元代書院的藏書事業〉，《圖書館》1996年第4期，頁70。

3. 見方建新等，〈中國私家藏書考略〉，杭州大學古籍所編《古文獻研究》第二輯（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初版）。

4. 汪辟疆，《目錄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四版），頁45-46。

5. 同註4，頁38。

刻書、藏書之事業，息息相關。二十世紀以來，有關元代刻書，學者論之甚多；相比之下，元代藏書的課題則較少引起學者注意。如楊立誠、金步瀛於七十年代初期編著《中國藏書家考略》所錄元代藏書家的材料，大抵承襲《藏書紀事詩》。八十年代以後，顧志興《浙江藏書家藏書樓》及《浙江藏書史》以區域文化為背景，探析了浙江省的藏書歷史。鄧洪波〈元代書院的藏書事業〉、〈元代書院藏書研究〉二文，<sup>(註6)</sup>較詳細地討論了元代書院藏書的特色。任繼愈主編《中國藏書樓》、傅璇琮主編《中國藏書通史》等大型著作，從宏觀的角度論述了元代藏書的情況。至於元代私人藏書的研究，猶有探討空間。

正如汪辟疆所說，官私簿錄類書籍，最能反映藏書狀況，但現存元人所著書目甚少。如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之〈史部·簿錄類〉著錄汲郡張氏《共山書院藏書目錄》、危素《史館購書目錄》、毛文在《上都分學書目》及《陸氏藏書目錄》四種。<sup>(註7)</sup>倪燦、盧文弨《補遼金元藝文志》之〈史部·簿錄類〉著錄《法寶總目十卷》一種。<sup>(註8)</sup>金門詔《補三史藝文志》則未有著錄任何簿錄類書籍。綜合各志著錄，元人編纂的書目不過寥寥數種。不見於上述藝文志者，官修有脫脫主編《宋史·藝文志》、王士點、商企翁同撰《秘書監志》；私修有莊肅《蓼塘藏書目》、<sup>(註9)</sup>袁桷為祖傳藏書所編《袁氏舊書目》及《袁氏新書目》、<sup>(註10)</sup>王惲為其父藏書所編《王氏藏書目錄》、<sup>(註11)</sup>岳自修所編《岳德敏書目》；<sup>(註12)</sup>寺觀書院編修有《延祐四明志》所載《慶元路先聖廟藏書目》、<sup>(註13)</sup>專記書板的《元西湖

6. 按：兩文分載《圖書館》1996年第4期，頁69-71及《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9月號，頁4-11。

7. [清]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載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初版）冊6，頁8410。參見[元]黃潛，〈陸氏藏書目錄序〉（載《文獻集》（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卷五，頁19a-20a。）及[元]柳貫，〈共山書院藏書目錄序〉（載《待制集》（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卷十六，頁1a-3a。）。

8. [清]倪燦撰、盧文弨補，《補遼金元藝文志》，載《二十五史補編》冊6，頁8503。

9. 見[元]陶宗儀，《南村綴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初版），頁340。

10. 見[元]袁桷，〈袁氏舊書目序〉、〈袁氏新書目序〉，《清容居士集》（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卷二十二，頁11a-13b。

11. [元]王惲，〈王氏藏書目錄序〉，《秋澗先生大全集》（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卷四十一，頁6a-9b。

12. [元]徐明善，〈岳德敏書目〉，《芳谷集》（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卷下，頁43a-57b。

13. 按：此目本無專名，僅附於《延祐四明志》所收袁桷〈重修先聖廟記〉之後。此文於《清容居士集》中名為〈慶元路重修先聖廟記〉，故本文姑以《慶元路先聖廟藏書目》名之。

書院重整書目》、《四明續志》所載《杜洲書院書板書籍目錄》。<sup>(註 14)</sup>諸藝文志所著錄及各家私修書目，今日悉已不傳。流傳至今的《元西湖書院重整書目》、《杜洲書院書板書籍目錄》與《慶元路先聖廟藏書目》等，登載書數較少，著錄內容亦嫌簡單。官修書目方面，《秘書監志》僅有經部，且只記部、冊之數，並無書名。《宋史·藝文志》乃據宋代國史館舊志刪節而成，《四庫全書總目》譏為諸史中最為叢脞之作。<sup>(註 15)</sup>故此在目錄學史上，元代被視為衰微不振的時期。<sup>(註 16)</sup>

據毛昭晰統計，自晉至清末，浙江藏書家約四百四十餘人，為各省之冠，而藏書樓就有二百餘處。<sup>(註 17)</sup>就元代而言，私家藏書是以江浙與大都為中心。<sup>(註 18)</sup>袁桷是元代浙江著名的藏書家，故籍多有提及。如孔齊《至正直記》云：

四明袁伯長學士，承祖父之業，廣蓄書卷。國朝以來，甲於浙東。<sup>(註 19)</sup>

袁桷曾祖父袁韶、祖父袁似道、父袁洪三世，牙籤皆饒。而袁桷藏書之處名東軒，其址在鄞縣南湖學士橋旁。全祖望〈湖語〉云：

淵然清容，丕振剡源遺老之幟。而牙籤之于王氏，亦復並峙。

自注則謂：「南湖藏書，前王後袁。」<sup>(註 20)</sup>可由此想見盛狀。陶宗儀《南村輟耕錄》「莊蓼塘藏書」一條，謂「江南藏書多者止三家，莊其一也」。<sup>(註 21)</sup>汪辟疆據而論曰：「陶氏所稱江南三家，其二不著姓氏，亡從考其何人。」<sup>(註 22)</sup>然觀《南村輟耕

14. 見鄧洪波，〈元代書院的藏書事業〉、〈元代書院藏書研究〉二文及〔元〕陳基，〈西湖書院書目序〉，《夷白齋稿》（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卷二十一，頁6a-9b。按：陳基所記《西湖書院書目》即《元西湖書院重整書目》。民初王式通撰〈元西湖書院重整書目提要〉云：「《西湖書院書目》見存杭州府學碑，前列四庫之目，據後跋則皆書版也，大率南宋胄監所采，入元遞有增補。」見《續修四庫全書提要》，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冊1，頁5。

15. 〔清〕永瑤主編，《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初版），頁728。

16. 昌彼得、潘美月，《中國目錄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初版），頁173。

17. 毛昭晰，〈浙江藏書家之精神〉，載黃進國、高躍新主編《中國古代藏書樓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初版），頁1。

18. 傅璇琮、謝灼華主編，《中國藏書通史》（寧波：寧波出版社，2001年初版），頁471-473。

19. 〔元〕孔齊，《至正直記》卷二〈別業蓄書〉，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初版）冊6，頁6587。

20. 〔清〕全祖望，〈湖語〉，〔清〕全祖望撰、詹海雲校註，《鮚埼亭集校註》（臺北：國立編譯館，2003年初版）冊2〈內編〉卷四，頁98。

21. 同註9，頁340。

22. 同註4，頁45-46。

錄》上下文且云：

至正六年，朝廷開局修宋遼金三史，詔求遺書，有以書獻者予一官。江南藏書多者止三家，莊其一也。繼命危學士〔太〕樸特來選取。其家慮恐兵遁圖讖，干犯禁條，悉付祝融氏。及收拾燼餘存者又無幾矣。（註23）

危素字太樸，陶書奪一「太」字。查危氏〈鄞江送別圖序〉道：

至正四年，素奉使購求故翰林侍講學士袁文清公所藏書於鄞。（註24）

可見危素奉命赴江南為史館求書，莊肅、袁桷二家，皆其採選目標。故陶宗儀所言「江南三家」，袁氏當亦其一也。然而，袁氏之書在其身後漸次散逸，兼以書目不傳，故藏書情形已難全面了解。所幸袁桷所著《清容居士集》及《延祐四明志》於今猶存，《清容居士集》所收〈袁氏舊書目序〉及〈袁氏新書目序〉尚可揭示其聚書之淵源。而同書中某些篇章，以及《延祐四明志》中的部份材料，亦能讓吾人管窺其藏書特色。本文擬以這些材料為中心，結合他書的相關內容，初步探析袁桷的藏書始末，以略見元人藏書之實況。

## 二、袁桷生平著作及學術思想概述

### （一）生平與著作

袁桷（1266-1327），字伯長，一字養直，號清容居士，晚號見一居士。慶元鄞縣（今浙江寧波）人。曾祖韶，登宋孝宗淳熙丁未（1187）第，官至資政殿大學士。祖似道，累官知襄州。父洪，建康府通判，宋亡不仕。家饒實，碩儒王應麟、胡三省、戴表元等皆曾館於其家。母史氏，故相史浩之後，桷生七日而卒。桷幼穎悟，絕棄戲弄。為童子時，已著聲。（註25）七齡，《詩》、《書》、《語》、《孟》

23. 同註9，頁340。

24. 〔元〕危素，〈鄞江送別圖序〉，《說學齋稿》（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卷三，頁14b。

25. 〔明〕黃宗羲，《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初版），頁21。

皆克誦習。(註26)十齡習詞章。妻鄭氏因父母雙亡，來歸。(註27)年十二，師事王應麟，受典制之學，深有造悟。(註28)年十三，承父命從戴表元學績文，脫去凡近。(註29)後且轉師舒岳祥、胡三省，尤長於論史，悉究前朝典故，叩之亹亹不倦。嘗謂宋末文章褻濫，益自奮厲，希古作者。嘗讀書於湖州慈感寺清容軒。(註30)趙孟頫爲之題字，且時往來流憩。(註31)成宗元貞元年(1295)，出任麗澤書院山長。(註32)二年(1298)，妻鄭氏、父洪相繼辭世。終身絕妾嬖，介潔自持。閻復、程文海、王構薦爲翰林國史檢閱官，(註33)大德五年(1301)赴任。(註34)六年(1302)，上《郊祀十議》于奉常院，周漢唐宋僞雜之說，悉釐正之。(註35)十一年(1307)，陞翰林國史院修撰。(註36)武宗至大二年(1309)，秩滿歸家，至仁宗皇慶元年(1312)官復舊職。(註37)延祐二年(1315)，爲殿試讀卷官。(註38)三年(1316)，爲翰林待制。(註39)期間屢隨仁宗至上都，且與趙孟頫、虞集、吳澄、馬祖常等人多有過從。英宗即位，陞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上〈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請購求遼金宋三史遺書。(註40)至治三年(1323)，丞相拜住薦爲翰林侍講學士。(註41)是年八月，御史大夫鐵失弑英宗，殺拜住，史稱「南坡之變」。泰定元年(1324)，辭官歸里。桷在翰林，詞藝冠絕。朝廷制冊、勳臣碑銘，多出其手。職內外制，纂修累朝實錄，多裨國論。其家舊有南園，退隱後

26. [元] 袁桷，〈立碑告墓祝文〉，同註10，卷四十三，頁26b。

27. [元] 袁桷，〈亡妻鄭氏事狀〉，同註10，卷三十三，頁25b。

28. [元] 孔齊，〈至正直記〉卷四〈四明厚齋〉，同註19，頁6663。

29. [元] 袁桷，〈祭戴先生〉，同註10，卷四十三，頁7b。

30. [清] 宗源瀚等修、周學濬等纂，〈湖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同治十三年（1874）刊本影印，1970年初版），頁1726。

31. [明] 王世貞，〈復清容軒記〉，《弇州四部稿》（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卷七十五，頁11b。

32. 按：戴表元〈送袁伯長赴麗澤序〉題於元貞乙未春十日。見〔宋〕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卷十二，頁19b-20a。

33. [明] 宋濂主編，〈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版）〈袁桷傳〉，頁4025-4026。

34. [元] 袁桷〈海陰陳處士墓誌銘〉載：「大德五年，桷備翰苑屬，後屢遷。」同註10，卷二十九，頁20b。

35. [元] 袁桷，〈書虞伯生送周南翁序後〉，同註10，卷四十九，頁3b。

36. [元] 袁桷〈有元故贈中憲大夫中書吏部侍郎騎都尉陳留郡伯郭公神道碑銘〉：「大德十一年，桷再入翰苑。」同註10，卷二十七，頁18a。

37. [元] 袁桷〈王子歲除告祖禰祝文〉載：「十月既望，蒙恩，復授舊職，遣官趣驛以進。」同註10，卷四十三，頁21b。

38. [元] 袁桷，〈禮闈倡酬（乙卯）〉，同註10，卷十四，頁11b。

39. [元] 袁桷〈己未封贈祝文〉：「延祐丙辰春，叨塵待制。」同註10，卷四十三，頁22b。

40. [明] 薛應旂修，〈浙江通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嘉靖四十年（1561）刊本影印，1983年初版），頁2129。

41. [元] 袁桷〈西山阡表〉，「五月，丞相忠獻王薦于英宗，超拜侍講學士。」同註10，卷三十三，頁1b。

構芳思享其中，日延親朋娛樂。撰《易說》、《春秋說》，未脫藁。泰定四年（1327）卒，年六十二。贈江浙行中書參知政事護軍、陳郡公，諡文清。<sup>〔註42〕</sup>有《延祐四明志》、《清容居士集》傳世。《元史》、《宋元學案》、《浙江通志》、《寧波府志》等有傳。

## （二）學術思想

袁桷少師戴表元、王應麟、舒岳祥等，博聞廣記，精於史學，長於考據。〈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云：

自惟志學之歲，宋科舉已廢，遂得專意宋史。<sup>〔註43〕</sup>

考袁桷十五歲時，乃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去宋亡甫兩載。「宋科舉已廢」一語，措詞甚為巧妙，實乃宋亡之後，元罷科舉之意。袁桷身為南宋舊家之後，心存故國之思，又無由問津仕途，唯有「專意宋史」，遂於史學考據訓練有素。陸友仁《研北雜志》云：

袁伯長學士博聞洽識，江左絕倫。謂張伯雨曰：「宋東都典故，能以歲記之。渡江後事，能月記之。」<sup>〔註44〕</sup>

可知其嫻於兩宋掌故。故〈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詳細開列應訪求之遼金宋三史遺書，良有以也。此外，袁桷修《延祐四明志》，全書分為沿革考、土風考、職官考、人物考、山川考、城池考、河渠考、賦役考、學校考、詞祀考、釋道考、集古考，四庫館臣譽其「考核精審，不支不濫，頗有良史之風」。<sup>〔註45〕</sup>而《清容居士集》所收文字，於書籍字畫每有考覈。至若袁桷對於理學的態度，孫瑜根據〈龔氏四書朱陸會同序〉及〈跋瑱山經德堂記後（象山先生作）〉，指出袁氏較早提出會同朱陸之說，頗為敬重朱熹。然其好考據之學，於朱陸理學興趣缺然，

42. 〔明〕張時徹修，《寧波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嘉靖三十七年（1558）刊本影印，1983年初版），頁2472-2474。

43. 〔元〕袁桷，〈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同註10，卷四十一，頁30a。

44. 〔元〕陸友仁，《研北雜志》（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卷下，頁1a。

45. 同註15，頁601。

且不滿於當時膜拜朱熹，空談性理之風。(註 46)楊亮則指出，袁桷於〈龔氏四書朱陸會同序〉中反對門戶之見的互相攻伐，認為於世無補，且有為陸學鳴不平之意。(註 47)實際上，袁桷曾祖袁韶之師袁燮乃陸九淵之門人。(註 48)故袁桷尊朱而不薄陸，提出「朱陸會同」，其因有自。

文學方面，四庫館臣論袁桷之詩文云：

其詩格俊邁高華，造語亦多工鍊，卓然能自成一家。蓋桷本舊家文獻之遺，又當大德、延祐間為元治極盛之際，故其著作宏富，氣象光昌，蔚為承平雅頌之聲。文采風流，遂為虞、楊、范、揭等先路之導，其承前啟後，稱一代文章之鉅公，良無愧矣。(註 49)

斯言可謂揄揚備至。袁桷早歲即從戴表元習詞章之學，而戴氏嘗言批評北宋末年以來的文風道：

後宋百五十餘年，理學興而文藝絕……江西諸賢，力肆於辭，斷章近語，雜然陳列，體益新而變日多，故言浩漫者蕩而倨，極援證者廣而顛。俳諧之詞，獲絕于近世，而一切直致，棄壞繩墨，焚爛不可舉。文不在茲，其何以垂後？(註 50)

對理學家重道輕文之思想甚不以為然，對江西詩派亦頗有批評。這種觀點自然影響到袁桷的詩文觀。錢基博論袁桷詩作：「其原出於陳子昂、李白，而上闡張協、郭璞，下參晚唐李商隱，以博麗救宋詩之野，以縹緲藥宋詩之直。」(註 51)可見其宗師晉唐，以矯宋人直野之弊。袁桷對李商隱情有獨鍾，曾云：「玉溪生往學草堂詩，久而知其力不能逮，遂別為一體。然命意深切，用事精遠，非止於浮聲切響而已。」(註 52)元代中葉以後的宗唐之風，桷實有以啟之。其對李商隱的推崇，在元

46. 孫瑜，〈袁桷的學術傳承、政治生涯及社會網路——元中期南士境遇之管窺〉，頁 184-185。載 dean.pku.edu.cn/bksky/2000tztwj/13.doc。

47. 楊亮，〈袁桷生平、學術淵源及心路〉，《殷都學刊》，2006 年第 2 期，頁 60。

48. 見〔清〕戴枚纂，《鄞縣志》（光緒三年（1877）刊本）〈袁燮傳〉。

49. 同註 15，頁 1435。

50. 〔元〕袁桷，〈戴先生墓誌銘〉，同註 10，卷二十八，頁 13a-13b。

51. 錢基博，《中國文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初版），頁 801。

52. 〔元〕袁桷，〈書湯西樓詩後〉，同註 10，卷四十八，頁 5a。



中期，漸演成宗唐大潮中的一股支流。其用心乃以義山之學杜，懲江西之學杜。  
 (註 53) 非唯如此，顧易生等評述云：「袁桷論詩的復古傾向殊堪注意。他從對宋詩的反思出發，批評了江西體、晚唐體、理學詩體、俗化詩體的流弊，提倡建安、黃初之詩，風雅比興之義，並朦朧地展示了以音節、體製為尚的元明兩代復古派的審美理想，故在由宋至明文學思想發展的過程中，他實是一個很重要的樞紐。」  
 (註 54) 可見其於近體詩宗唐外，古詩更追本漢魏，相對明代前後七子的師古說而言，袁桷可謂重要的先驅者之一。其於元、明文學史上的地位，自此可見一斑。

### 三、袁桷文獻學思想管窺

#### (一) 論版本目錄

葉德輝《書林清話》云：「自鏤版興，於是兼言板本，其例創於宋尤袤《遂初堂書目》。目中所錄，一書多至數本。」(註 55) 自尤袤以後，編書目仿用其例的尚甚罕見，在明代唯有嘉靖間晁瑬《寶文堂書目》。(註 56) 然袁桷《清容居士集》某些序跋，已經涉及版本問題。如〈書陸淳春秋纂例後〉云：

吾里樓宣獻公晚歲欲明義例之說，時永嘉陳君舉舍人為《春秋傳》，遂序其意而焚其稿，每語後進當以唐陸淳《集注》《纂例》、清江劉氏傳為下手。余家所藏《纂例》乃寶章桂公所校，號為精善。按《纂例》他無善本，審此書廢已久，聞蜀有小字本，惜未之見。《唐志》：《纂例》十卷，《集注》三十卷，《微旨》二卷，《辨疑》七卷。余來杭復得《微旨》二卷，迺皇祐間汴本。聞荅溪直齋陳氏書目咸有之，當搜訪以足。(註 57)

論及陸淳《春秋纂例》有兩種版本，一為家藏寶章桂公校本，一為蜀有小字本，而以桂校本為善本；又根據《唐志》及《直齋書錄解題》考據陸氏《春秋》諸作。

53. 張紅，《元代唐詩學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6年初版），頁105。

54. 顧易生、蔣凡、劉明今，《宋金元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初版），頁968。

55. 葉德輝，《書林清話》（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據民國九年（1920）刊本影印，1976年初版）卷一，頁5a。

56. 同註16，頁58。

57. [元]袁桷，〈書陸淳春秋纂例後〉，同註10，卷四十八，頁10b-11a。

(註 58) 其行文之內容體式已與明清藏書家之言甚為相似。

袁桷精於賞鑑，善於發現問題。如其發現李後主詩藁原係錢惟演所有，遂論曰：

(李後主) 晚歲幽憤，溢于歌詠，竟以憂死。徐鼎臣痛東鄰之煽禍，怨歸錢氏。而此卷文僖（錢惟演一筆者按）寶之，何耶？（註 59）

在袁桷看來，南唐亡國，吳越有罪焉。南唐、吳越既為寇讎，錢惟演身為吳越王後人，自不當以李後主詩藁為寶。

袁桷去世後，蘇天爵撰〈元故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贈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袁文清公墓誌銘〉，稱許袁氏：

於近代禮樂之因革、官閥之遷次、朝士大夫之族系、九流諸子之略錄，悉能推本源委而言其歸趣。（註 60）

所謂「近代禮樂之因革、官閥之遷次、朝士大夫之族系」，皆與宋代史料有關。而「九流諸子」一語，雖僅齒及丙部之書，實則舉一概全；至謂「推本源委而言其歸趣」，似言袁桷嘗為其藏書撰寫提要。換言之，蘇氏意指袁桷於史學考據之外，亦精於目錄之學。《袁氏新、舊書目》今已不存，且二書之序主要講述其家藏書聚散之經過，《清容居士集》所收其他文章之內容罕有涉及書籍分類者，而現存《延祐四明志》又無經籍志。袁桷之目錄學涵養如何，雖難全面了解，尚可根據零星資料而管窺之。〈定海縣學藏書記〉載泰定二年（1325），定海縣令捐俸為縣學聚書，勉諭學中耆老云：

經以窮理，史以究成敗。廣聞修辭，惟子、集是宜。（註 61）

元代科舉有考辭賦之環節，故縣令購求子、集二部之書，有功利原因。抑有進者，

58. 按，考《新唐書·藝文志》，著錄陸淳《春秋纂例》十卷，《春秋微旨》二卷，《春秋辨疑》七卷。見〔宋〕歐陽修主編，《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版），頁 1441。又《舊唐書》陸淳本傳謂其「著《集注春秋》二十卷」。見〔後晉〕劉昫主編，《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版），頁 4978。

59. 〔元〕袁桷，〈跋李後主詩藁〉，同註 10，卷四十六，頁 27a。

60. 〔元〕蘇天爵，〈元故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贈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袁文清公墓誌銘〉，《滋溪文稿》（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 年初版）卷九，頁 13a。

61. 〔元〕袁桷，〈定海縣學藏書記〉，同註 10，卷十八，頁 26a。

此雖縣令之言，然袁桷見解必與之相近，方才錄於文中。由於袁氏並不熱中理學，故其對子、集之書較為包容，非理學家斥為背道害道可比。

袁氏乃江南簪纓舊族，早期藏書中本已有甚為豐富的宋代史料，故袁桷少年時代已對宋史產生興趣。當時主要的整理工作，便是將這些史料分類彙集。如〈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云：

自惟志學之歲，宋科舉已廢，遂得專意宋史，亦嘗分彙雜書、文集及本傳、語錄，以次分別。(註62)

圖書分類，不外「質」與「體」兩種標準。所謂「質」即書的內容，所謂「體」即書的著作體裁。(註63)觀袁桷整理的史料有雜書、文集、本傳及語錄四種，本傳固屬史部，而語錄屬子部，文集屬集部，雜書當即史部雜史類、子部雜家類、甚至集部詩文評類等筆記之書。諸書雖皆存有史料，然體例各異。故分彙以次分別，可見袁桷於少年之時已開始注意到書籍的「體」、「質」之辨。因為訓練有素，日後遂能勝任編纂《袁氏新、舊書目》。

自《隋書·經籍志》以來，官私書目之分類多依「體」不依「質」，因書而設部。故清人章學誠將學術之不能專精，後世無專門之學，也無專門之書，歸咎於這種以書籍淆亂部次的分類法。(註64)南宋尤袤《遂初堂書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大都遵循四部分類法。唯《直齋書錄解題》如汪辟疆所言，不標經史子集之名，將歷代典籍區為五十三類。(註65)《袁氏新、舊書目》之序未有討論部次分合，蓋於體例上以承襲前人為主，少有發明。《清容居士集》中時或提及陳振孫《解題》，且袁氏之書又有陳氏舊藏者，故《袁氏新、舊書目》分類遵從直齋體例，也未可知。(註66)綜而觀之，《袁氏新、舊書目》分類，大抵亦依「體」而不依「質」。

儘管如此，參看袁桷〈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一文所列有關宋代史

62. 〔元〕袁桷，〈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同註10，卷四十一，頁30a。

63. 同註16，頁110。

64. 同註16，頁140。

65. 同註4，頁43。

66. 按，《延祐四明志》卷十三收錄袁桷所作〈重修先聖廟記〉，文後附有《慶元路先聖廟藏書目》。此目著錄書籍僅八十二種，不標經史子集之名，大體仍循四部分類法，與《直齋書錄解題》類似。唯其部次略嫌凌亂，僅標冊數而不言卷數，如一賬簿。

料的書單，仍可知其「質」、「體」並重之意。如其論翰林云：「宋翰林視唐尤加清重，有雜書可補志書者。」又列出《金坡遺事》、《翰林雜記》、《續翰林志》三書。此三者皆為雜史類著作，而皆與翰林掌故有關。又如其論地志，則舉《太平寰宇記》、《皇祐方域圖志》、《皇祐地理新書》、《元豐九域志》四書。有時袁氏對「質」之注重更甚於「體」。如其論五代史，謂「宜用偽史參照作世家」，而所列書目則有《十國紀年》、《南唐書》、《閩王事跡》、《江南野史》等九種。觀《十國紀年》乃編年體，《南唐書》乃紀傳體，《閩王事跡》乃本紀體，《江南野史》乃雜史，體例各有不同。又如袁氏提出要「訪尋四境關涉諸書」如《高麗圖經》、《至道雲南錄》、《趙元昊西夏事實》、《遼金誓書》等九種。《高麗圖經》乃外紀，《至道雲南錄》類近後世省志，《趙元昊西夏事實》乃霸史類，《遼金誓書》乃文告類，不一而足。此外，袁桷在〈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中指出南宋國史館所修藝文志的缺失：

藝文志自元豐後該載未盡，宜以今世所行書籍備載，舊制進呈者入書目，亦當以《館閣書目》為主，分類補入。（註67）

元豐乃宋神宗年號，可見彼時以來之書，國史館藝文志所錄皆未詳備。袁桷認為北宋後期以降的著作，流傳仍廣，故提出以《館閣書目》為主體，分類補入這些著作。

## （二）從《慶元路先聖廟藏書目》看袁桷的圖書分類

《袁氏新、舊書目》現已不存，袁桷名下書目於今可見者唯有《延祐四明志》中〈重修先聖廟記〉載錄的「書籍」類（本文姑稱之為《慶元路先聖廟藏書目》）。考察《慶元路先聖廟藏書目》的內容，可見袁桷圖書分類觀念之一斑。自劉向父子以後，編纂目錄能「條其篇目」、「撮其旨意」者雖然不多，但大多數尚記載了作者姓名與卷數，以備考核。《慶元路先聖廟藏書目》著錄書籍僅八十二種，雖大致按四部分類，卻未明標經史子集之名。這除可解釋為書籍數量少，無須細緻分類外，大概也有《直齋書錄解題》的影響在。進而言之，《慶元路先聖廟藏書目》

67. [元] 袁桷，〈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同註10，卷四十一，頁39b-40a。

的分類有幾點特色：

- 一、經部書籍先列經總類（如《注疏九經》、《四書集成》等），次列單經類（如《春秋左傳》、《東萊尚書解》等）。
- 二、史部書籍先列通史類（如《通鑑綱目》、《九朝通鑑》等），次列斷代史類（如《北齊書》、《周書》等），次列史評類（如《讀史管見》）。
- 三、集部書籍中，詩註（如《山谷詩註》、《東坡詩註》、《后山詩註》）置於白文別集（如《柳文集》、《蒙齋文集》等）之後。
- 四、類書（如《藝文類聚》、《孔白六帖》、《事類合璧》等）不置於子部，而列於別集之後，且與總集（如《宋朝文鑑》、《續文章正宗》）相雜。
- 五、本地方志（如《舊四明志書》、《續四明志書》）殿於全目最後。

若說經、史二部先合（經總、通史）而後分（單經、斷代史）只是一家之取向，那麼集部的編排則體現出編纂者對詩註的認知。自《漢書·藝文志》以來，註本（包括《毛詩訓詁傳》、《尚書大傳》等）一向和白文本夾雜不分。但註本中多少貫穿著註者自己的思想，與原作者之意或有出入。且如《山谷詩註》、《東坡詩註》、《后山詩註》等，其註以賞析詞章為主，與詩文評類為近，故置於白文本之後，有一定的道理。其次，類書之歸類，長期莫衷一是。荀勗《中經新簿》入丙部（史），《隋書·經籍志》入子部，皆有其背景因素。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則承《隋志》而歸入子部。然與九流十家不同，類書並非以立言為宗，以剖析義理為本。故《慶元路先聖廟藏書目》置於別集之後。至於歷來總集之編纂，仍難脫離分類之格局。如《詩經·國風》以國別分，《昭明文選》以體裁分，《河嶽英靈集》以作者分，不一而足。不過，類書的分類是手法而非內容，其分類可以史事、人物、自然事物甚至詞彙為單位，未必皆關乎辭章之學。因此，將類書與總集相雜，雖不為無因，卻也有其局限。復次，將本地方志如《舊四明志書》、《續四明志書》等自史部獨立出來作壓卷之用，蓋因《慶元路先聖廟藏書目》本為地方文獻，遂有強調在地文化之必要。

不可諱言的是，《慶元路先聖廟藏書目》頗有未愜人意處。其一，觀此目之著錄，如「注疏九經五十七冊」、「通鑑一十三冊」等，只記冊數，不記卷數。冊數之多寡，視乎裝訂者之喜好，根本不可能如卷數一般，藉以判斷書籍之內容、版

本與真偽。如此目著錄「柳文集兩部共三十五冊」，<sup>(註 68)</sup>總冊數既為奇數，則這兩部柳集的冊數一定不同。進而言之，這兩部柳集的不同，是只在於裝訂各冊的厚薄，還是關涉卷數、版本之差異？根本無從得知。故此，紀錄冊數僅可為收藏者提供方便，於學者卻助益甚微。復次，本目不記作者，同樣妨礙了學者之研究。如其著錄「南唐書五冊」，<sup>(註 69)</sup>此書究竟為馬令《南唐書》，還是陸游《南唐書》？讀者同樣無法分辨。再者，《慶元路先聖廟藏書目》雖大抵按四部分類，在排列上卻每有未安之處。如「元次山集二冊」置於「周子太極圖二冊」之後，<sup>(註 70)</sup>是竄集部入子部；「大學衍義六冊」置於「后山詩註三冊」之後，<sup>(註 71)</sup>是竄子部入集部；「朱子語略五冊」置於「后山詩註三冊」之後，<sup>(註 72)</sup>亦是竄子部入集部；他如「宋朝文鑑三十七冊」置於「藝文類聚二十冊」與「孔白六帖一十七冊」之間，<sup>(註 73)</sup>亦屬不倫。即使同一部之內，前後次序亦有不當。如「南齊書二十冊、南唐書五冊、宋書六十冊」，<sup>(註 74)</sup>《南齊書》在《宋書》之前，《南唐書》在宋、齊二書之間，不知何意。「杜詩一十二冊」次於「東坡大全集六十冊」，<sup>(註 75)</sup>時代先後顛倒。

或謂〈重修先聖廟記〉的正文雖乃袁桷所撰，而附於文後的《慶元路先聖廟藏書目》與「贍學田土」、「屋宇」、「祭器」、「書籍」、「設官」等清單皆為廟方所提供，而非袁氏自撰。即便如此，這些清單的內容必已先得袁氏首肯，方才繫以其名。然此書目著錄書籍僅八十二種，兼以袁桷的文獻學修養，若欲綱舉目張、有條不紊，洵非難事。其分類之訛誤屢見，似乎有些令人費解。實際上，觀《宋史·藝文志》之叢脞，《秘書監志》只記部冊之數、不記書名，可知元代目錄學的衰微不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袁桷對於《慶元路先聖廟藏書目》的紕繆並不在意，就不足為奇了。

68. [元]袁桷，〈重修先聖廟記〉，《延祐四明志》（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卷十三，頁29b。

69. 同註68，卷十三，頁29a。

70. 同註68，卷十三，頁29b。

71. 同註68，卷十三，頁30b。

72. 同註68，卷十三，頁30b。

73. 同註68，卷十三，頁31a。

74. 同註68，卷十三，頁29a。

75. 同註68，卷十三，頁30a。

## 四、袁氏聚書之經過

### (一) 袁氏先祖的聚書

潘美月先生嘗謂宋人藏書，來源不外三端：一曰手自抄寫，二曰採購，三曰餽贈。<sup>(註 76)</sup>袁氏爲南宋望族，聚書之方式亦以此三者爲主。考其藏書之始，肇自袁桷曾祖袁韶。〈袁氏舊書目序〉云：

始曾大父越公舉進士時，貧不能得書。書多乎〔手〕抄強記，至用高祖妣齊國夫人魚鮑冠學書。後官中都凡二十有五年，乃務置書，以償宿昔所志。其世所未有，則從中祕書及故家傳錄以歸，於是書始備矣。于時國家承平，四方無兵革之虞，多用文儒爲牧守。公私間暇，擊鮮享醴，會寮屬以校讎刻書爲美績，至於細民亦皆轉相模鋟以取衣食。而閩之建、蜀之益，其最著者也。<sup>(註 77)</sup>

袁韶藏書數量如何，無從得知。然袁桷以「備」言之，可見其書之豐。所謂「乃務置書，以償宿昔所志」，蓋指較常見之書，而其裒集亦當以採購福建、四川刊印者爲主。至於罕見之書，便至宮中及故家抄錄。而袁氏藏書樓之建造，乃在袁韶告老辭官以後：

紹定辛卯，公自宥府歸里，遂累土爲堂，貯所得書於東西榮。公日處其中，客至不復道世事，……如是者七年而薨。<sup>(註 78)</sup>

考紹定辛卯爲宋理宗紹定四年（1231），距袁桷出世三十餘年，可見其家藏書傳統乃祖孫相繼。袁韶除藏書外，也曾自著書：

顧嗜陳黃詩，擇其適意者手書爲編，寓物詠歌，與道游遨，休休焉不知其年之將耄。<sup>(註 79)</sup>

76. 潘美月，《宋代藏書家考》（臺北：學海出版社，1980年初版），頁7-9。

77. 〔元〕袁桷，〈袁氏舊書目序〉，同註10，卷二十二，頁11a。

78. 同註10，卷二十二，頁11a。

79. 同註10，卷二十二，頁11a。

可知袁韶好黃庭堅及陳師道、陳與義詩，並曾編纂選本。

據〈袁氏舊書目序〉所言，袁韶當年之書至袁桷童年恐已有散失：

桷幼聞公從學正獻公，時有手校九經，旁說疑義皆附書左右，最為精善。

欲從諸父一觀而未得。(註80)

「手校九經」乃袁韶求學時所作，當為批校本，然袁桷幼年之時已未得見。袁韶去世後，其藏書似為諸子所分：「欲合諸父之藏分第為目錄，亦不果。」(註81)若藏書仍在一處，袁桷當不必「合諸父之藏分第為目錄」。抑有進者，袁桷諸父所藏之書殆皆毀於兵火：

竊嘗謂天下之物，聚多者終必散，或者早計於未散，則庶幾幸有一存之理。遂悉藏於山中。己丑之災，偕家人渡江以逃，袁氏之書一夕而盡，昔之預計者乃幸而獲全。嗚呼！此公（袁韶一筆者按）之靈有以啟其衷也。惟公以勤勞起家，其書之傳，不幸而不存，固當歸之於數；其幸而獲存者，敢不襲藏心思而躬踐之，以求無忘前人之意？(註82)

所謂己丑之災，是指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正月的楊鎮龍之亂。當時距宋亡不過十年，江南尚有抗元餘軍，社會環境未算安定。楊鎮龍起事波及四明，袁氏家族逃難。玩序言之意，「袁氏之書一夕而盡」，係指袁桷諸父分得的袁韶遺書；而藏於山中、得免於災的部分書籍，實乃袁桷一房所有者。藏於山中的建議，是袁桷審計時勢後向其父袁洪提出的。參戴表元〈乙丑正月六日袁季源家遭毀次韻書悶詩〉曰：

鄴侯家裡書千架，杜老尊前屋萬間。此事吾堪慰流落，邇來天亦姑窮閑。  
反風待禱真虛語，噴雨無方自厚顏。間挈殘家過西塢，風流還許幾生還。

(註83)

80. 同註10，卷二十二，頁11a。

81. 同註10，卷二十二，頁11b-12a。

82. 同註10，卷二十二，頁12a。

83. [宋]戴表元，〈乙丑正月六日袁季源家遭毀次韻書悶詩〉，同註32，卷三十，頁6a。



季源乃袁洪表字。此詩益可證明己丑災後，袁氏家族所藏，僅袁洪、袁桷一房分得之書免遭回祿。這批書後來由袁桷整理編目，著錄於《袁氏舊書目》，成為袁桷東軒圖書的重要典藏部分。

## (二) 袁洪、袁桷父子的聚書

楊鎮龍之亂後，袁洪、袁桷父子又繼續聚書：

其年（己丑—筆者按）夏，大人過故都，復購遺闕，篋載以歸。意者斯文之富，將過乎昔。而余又思旁搜遠錄，俾夫昔日之藏矣。（註84）

楊鎮龍之亂同年的夏天，袁洪便前往杭州大量購置家中缺漏之書，卷帙甚或超越昔時。而袁桷亦計劃抄錄罕見之書，以圖恢復舊觀。由此足見洪、桷父子的聚書方法，多為採購、抄錄。袁氏所採購者除新槧外，亦有故家散出之書。袁桷〈跋定武禪帖〉云：

霅溪陳侍郎振孫伯玉，號直齋，其家藏書冠東南，今盡散落，予家亦得其數十種。（註85）

袁氏所得數十種直齋舊藏，其目不可知。然陳振孫乃南宋著名藏書家，所儲多珍稀之本，故流落袁家者當亦不乏善本。

袁家交遊廣闊，藏書亦有不少來自餽贈者。袁桷云：「先君子蚤承師友，晚固艱貞。」（註86）王應麟、胡三省、戴表元、黃震名儒，皆為袁洪友人。袁桷〈師友淵源錄〉記載黃震：

性不喜鄉里，獨作書，以所為《日抄》一編寄贈。（註87）

可知《黃氏日抄》在袁氏父子藏書之列。又葉昌熾《藏書紀事詩》曰：

84.〔元〕袁桷，〈袁氏新書目序〉，同註10，卷二十二，頁13a。

85.〔元〕袁桷，〈跋定武禪帖〉，同註10，卷四十六，頁12a。

86.〔元〕袁桷，〈師友淵源錄〉，同註10，卷三十三，頁13b。

87.〔元〕袁桷，〈師友淵源錄〉，同註10，卷三十三，頁17a。

欲知梅礪藏書窖，甬上南湖學士橋。(註88)

胡三省館於袁家，非僅將己書藏於其家東軒石窖，且亦將著作贈與袁氏。〈師友淵源錄〉云：

(胡氏)釋《通鑑》三十年，兵難，藁三失。乙酉歲，留袁氏塾，日手抄定註。己丑寇作，以書藏窖中，得免。定註今在家。(註89)

所謂「定註」，即今日所見《音註資治通鑑》。此書既在袁家，必為胡三省所贈。王應麟著作，亦復類似。袁桷〈王先生困學紀聞序〉云：

桷游公門最久，官翰苑時，欲悉以其所著書進于朝廷，因循不果。(註90)

則王氏所著書於袁桷家皆有度藏，毋庸置疑。再如戴表元去世後，袁桷上疏元帝，請刻印其遺文為《戴剡源先生集》，則戴氏詩文稿本或鈔本當在袁桷處。

其次，袁桷以「備」形容袁韶藏書，又謂至元己丑災後，「斯文之富，將過乎昔」，可知其家所聚各部各類之書，應頗齊全。在此基礎上，袁桷論云：

余少讀書有五失焉：雅觀而無擇，濫閱而少思，其失也，博而寡要。攷古人之言行，意常退縮不敢望，其失也，懦而無立。纂錄史籍之故實，一未終而屢更端，其失也，勞而無成。聞人之長唯恐不及，將疾趨從之而輒出其後，其失也，欲速而過高。好學為文，未能蓄其本，經術隱奧，茫乎其無所適從，泛然而無所關決，是又失之甚者也。夫為學之道，用志不能不一，用力不能不專。農夫莽而廣種，不如狹墾之為實也。工人泛而雜學，不如一藝之為精也。往者書未模印時，爭傳寫授讀，較余所藏之書不能十一。而士以三年通一經，其自得之實皆足以傳世垂後。其視余之書多無成者，豈古人所謂沃土無善民之說與！(註91)

袁桷自稱少時雅觀無擇、濫閱少思，固然與其家藏書之富有極大關係。然其自十

88. 同註1，頁84。

89. [元]袁桷，〈師友淵源錄〉，同註10，卷三十三，頁16b。

90. [元]袁桷，〈王先生困學紀聞序〉，同註10，卷二十一，頁14b。

91. [元]袁桷，〈袁氏新書目序〉，同註10，卷二十二，頁13a。

五歲起，便對宋史產生興趣。<sup>(註 92)</sup>他提出「用志不能不一，用力不能不專」，且謂「攷古人之言行，意常退縮不敢望，其失也懦而無立」、「纂錄史籍之故實，一未終而屢更端，其失也勞而無成」，顯示其對史學考據之重視，也隱然表示《袁氏新書目》編成後，未來之聚書方向當主於史料。英宗時，丞相拜住欲修史，袁桷上〈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其中所列遼金宋三史遺書，部分乃家中舊藏，其餘當即後來蒐集之成果。後英宗被弑，袁桷不克秉筆，相關史料仍存家中。胡文學《甬上耆舊詩》云：

至公歿二十餘年，會脩宋遼金三史，遣使者求郡國遺文故事，唯公家上  
藏書數千卷，足備典實。<sup>(註 93)</sup>

元惠宗重開史館時，袁桷孫曦所獻數千卷，蓋為事狀中所列之部分書籍。

## 五、袁桷藏書之特色

《袁氏新、舊書目》業已失傳，其家藏書數量如何，已難考知。但從《清容居士集》中猶可了解袁桷藏書的特色。前文已言，袁家世仕南宋，故宋史資料甚富，由〈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可見概貌。其言曰：

本院（翰林院—筆者按）宋朝名臣文集及雜書紀載悉皆遺缺，亦當著具  
書目，以備采擇者。<sup>(註 94)</sup>

南宋亡後，臨安內府藏書悉數運往大都。而事狀所列書籍大率乃元翰林院所無者，自亦不見於南宋內府舊藏，其珍貴可想而知。如其論靖康之難云：

徽欽圍城受辱，北行遭幽，正史不載。所有雜書野史，可備編纂。今具  
於後：

92. [元] 袁桷〈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自惟志學之歲，宋科舉已廢，遂得專意宋史。」同註 10，卷四十一，頁 30a。

93. [清] 胡文學，《甬上耆舊詩》（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 年初版）卷三，頁 3a。

94. [元] 袁桷，〈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同註 10，卷四十一，頁 31a。

《三朝北盟會編》	《靖康傳信錄》
《孤臣泣血錄》	《靖康草史》
《靖康奉使》	《靖康遺錄》
《裔夷謀夏錄》	《陷燕記》
《南歸錄》	《靖康錄》
《犯闕錄》	《偽楚錄》
《松漠紀聞》	《偽齊錄》
《起戎錄》	《痛憤錄》
《建炎復辟記》	《己酉航海記》
《建炎扈從錄》	《中興遺史》 <sup>(註 95)</sup>

因徽欽二帝北狩遭辱，南宋官方羞於齒及，故所修國史也闕漏不載。袁桷所列雜史類著作二十種，多第一手材料，實可資史官參詳採用。有關宋哲宗時新舊黨爭，南宋國史館之記載仍有不足：

元符至元祐事，趙鼎雖於紹興改正，亦有隱諱。今可考證增入者，今具於後：

《邵氏辨誣》	《元祐黨籍傳》
《尊堯集》	《丁未錄》
《符祐本末》 <sup>(註 96)</sup>	

指出趙鼎雖在宋高宗時為元祐黨人平反，但所書也有忌諱，故開列罕見雜史五種，以求史論之持平。至於史傳的纂修，袁桷認為「必當先以實錄、小傳附入九朝史傳，仍附行狀、墓誌、神道碑，以備去取」，且於書單中列出「諸家文集」。有關文集的運用，袁氏指出：

杜太后金滕之事，趙普因退居洛陽，太宗嫉之。後以此事密奏，太宗大喜。秦王廷美、吳王德昭、齊王德芳皆繇普以死。今《宋史·普列傳》

95. 同註 10，卷四十一，頁 32a-33a。

96. 同註 10，卷四十一，頁 34a。

無一語及之。李燾作《通鑑長編》，亦不敢載。私家作普別傳，始言普將死，見廷美坐於牀側，與普忿爭。其集號《巽巖集》，所宜搜訪。(註97)

宋太宗之即位，斧聲燭影，千古迷離，南宋李燾《資治通鑑長編》礙於忌諱，亦未有載錄此事。然據今人王承略、楊錦先的考辨，李燾號巽巖先生，曾撰有〈趙普別傳〉一卷。(註98)袁桷以爲太宗即位之事與趙普關係頗大，且李燾曾私下爲趙普作傳，紀錄了一些逸聞，故提出搜訪李燾文集之請。袁氏知李燾文集名《巽巖集》，亦知集中所錄〈趙普別傳〉之內容，然無此書，實亦因爲己丑之災：

不幸西城火災，舊書盡燬，然而家世舊聞，耳受目覩，猶能記憶……凡所具遺書，散在東南，日就湮落。或得搜訪，或得給筆札傳錄，庶能成書，以備一代之史。(註99)

以此而知，事狀所列書籍近一百五十種，縱非袁桷當時所有，然亦應是其家舊有而毀於兵火者，故「耳受目覩，猶能記憶」。錢大昕云：

顧其所覩列者皆東都九朝之遺事，至于南渡七朝之紀載，略不齒及，豈有所忌諱而不欲盡言者與？(註100)

錢氏猜測，固然近理。然觀其後袁曦所捐之書有數千卷，數千卷以一百五十種相除，則每種竟有數十卷之篇幅，於理難合。知袁桷所藏北宋史料雖不足舊日一百五十餘種之多，但若合以南宋史料來計，則又遠遠不止一百五十種之數矣。

兩宋史料以外，袁桷所藏書籍中頗有珍品。如前文所言，陸淳《春秋纂例》乃寶章桂氏精校本，李後主詩乃作者手稿。復如王應麟《困學紀聞》、戴表元文集等，皆由袁桷刊行，則二書稿本當亦在袁桷處。

除書籍外，袁桷藏有甚多字畫碑帖。《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五至卷五十悉爲題跋類文字，題跋者包括書籍、字畫、碑帖、誥牒等，內容時涉考證。而字畫碑帖

97. 同註10，卷四十一，頁31b。

98. 王承略、楊錦先，《李燾學行詩文輯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初版），頁67。

99. 同註10，卷四十一，頁40a。

100. 〔清〕錢大昕，〈跋清容居士集〉，載《清容居士集》（臺北：藝文印書館據原刻《百部叢書集成》所收道光郁松年校刊《宜稼堂叢書》本影印，1967年初版），頁1。

之題跋，又多於書籍題跋。這些文物乃袁桷家藏，抑或本為他人所有而袁桷受囑題字，僅小部分可考。如其〈書陸淳春秋纂例後〉謂「當永為子孫寶，俾勿墜」，<sup>(註 101)</sup>可知《春秋纂例》乃其家所藏。而〈書鄭潛庵李商隱詩選〉曰「因書其說而歸之」，<sup>(註 102)</sup>則此書並非袁桷所有。不過其收藏之富，仍可從後人記述中得見一隅。似《趙氏鐵網珊瑚》記〈米元暉湖山煙雨圖〉：「此圖四明袁文清公居館閣時所嘗收蓄者也。」<sup>(註 103)</sup>《清河書畫舫》記〈文湖州畫盤谷圖〉：「此圖乃袁文清公家舊物。」<sup>(註 104)</sup>是皆其所藏圖畫。《珊瑚網》記〈顏魯公爭坐位帖〉：「上有賈似道印，為元人袁文清公物。」<sup>(註 105)</sup>《御定佩文齋書畫譜》記〈宋高宗書徽宗御集序〉：「後有龍舒故史胡理跋，亦無歲月，但云『書於袁桷清容齋』，蓋元袁文清公伯長所藏。」<sup>(註 106)</sup>是皆其所藏字帖。

## 六、袁氏藏書之散逸

有關袁氏藏書之散逸，各家說法略有異同。孔齊《至正直記》云：

伯長沒後，子孫不肖，盡為僕幹竊去，轉賣他人，或為婢妾所毀者過半。

且名畫舊刻，皆賤賣屬異姓矣。<sup>(註 107)</sup>

葉昌熾《藏書紀事詩》、楊立誠、金步瀛《中國藏書家考略》、任繼愈《中國藏書樓》、顧志興《浙江藏書家藏書樓》、《浙江藏書史》等皆從此說。<sup>(註 108)</sup>然孔齊所言似有矛盾之處：其書既「盡為僕幹竊去」，又何來「婢妾所毀者過半」？抑或婢妾先毀其半、僕幹復竊其餘？顧嗣立《元詩選》云：

101. 〔元〕袁桷，〈書陸淳春秋纂例後〉，同註 10，卷四十八，頁 11a。

102. 〔元〕袁桷，〈書鄭潛庵李商隱詩選〉，同註 10，頁 9b。

103. 〔明〕朱存理，《趙氏鐵網珊瑚》（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 年初版）卷十一，頁 24b。

104. 〔明〕張丑，《清河書畫舫》（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 年初版）卷七下，頁 13b。

105. 〔明〕汪珂玉，《珊瑚網》（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 年初版）卷二十二，頁 52a。

106. 〔清〕聖祖皇帝，《御定佩文齋書畫譜》（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 年初版）卷六十八，頁 33b。

107. 〔元〕孔齊，《至正直記》卷二〈別業蓄書〉，同註 19，頁 6663。

108. 同註 1，頁 84；參見楊立誠、金步瀛編，《中國藏書家考略》（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 年初版），頁 174；任繼愈主編，《中國藏書樓》（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 年初版）；顧志興《浙江藏書家藏書樓》（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初版），頁 71；顧志興《浙江藏書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07 年初版），頁 139。

伯長沒後二十餘年，會修宋遼金三史，遣使求郡國遺文故事，惟袁氏所傳為最多。故家文物，萃於東南，百年以來，流風未墜。(註 109)

惠宗朝修宋史，曾遣使往鄞縣搜求袁桷藏書。而奉使之入乃危素，其言曰：

至正四年，素奉使購求故翰林侍講學士袁文清公所藏書於鄞，屬其孫曦同知諸暨州事，方以事往海中，待之，久而後還。(註 110)

清人錢大昕〈跋清容居士集〉指出，將宋代史料數千卷贈與國家者，正是袁曦：

厥後三史刊修，伯長已不及見。而其孫曦以家藏書數千卷上之史局，袁集之功，為不虛矣！(註 111)

蘇天爵為袁桷作墓誌銘曰：

孫男曦，以公蔭入官，既進遺書於朝，遂擢祕書監著作郎。(註 112)

袁曦乃桷長孫，既曾親炙其祖，又以祖蔭得官，於其祖遺書蓋未敢疏忽大意，故有捐書史局之事。不過孔齊乃元末時人，因兵禍而避居四明，(註 113)其謂婢妾毀書、僕幹竊書，雖或耳食之言，蓋亦空穴來風，未必無因。竊以袁曦捐書既在惠宗初年（危素云至正四年），袁家餘書的亡失恐在惠宗後期。時天下已亂，兵燹四起，袁曦蓋已去世。袁氏家族衰落，後代黯弱，書籍遂星散矣。然顧嗣立謂袁桷後人「百年以來，流風未墜」，可見其家仍保有部份藏書。考清代前期，胡文學編纂《甬上耆舊詩》，尚得力於袁氏後人。其言云：

余初選此集，其後人即手鈔世傳遺草見示。數百年文獻未墜于地，斯可謂故家矣！(註 114)

109. [清] 顧嗣立，《元詩選》（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初集卷十九，頁2a-2b。

110. [元] 危素，〈鄞江送別圖序〉，同註 24，卷三，頁 14b。

111. [清] 錢大昕，〈跋清容居士集〉，同註 100，頁 1。

112. [元] 蘇天爵，〈元故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贈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袁文清公墓誌銘〉，同註 60，卷九，頁 12b。

113. 見《至正直記》書前小序，同註 19，頁 6555。

114. 同註 93，卷三，頁 2b。

所謂「手鈔世傳遺草」，當即《清容居士集》。此書乃袁桷親著，其後人猶存鈔本。胡氏由此稱「數百年文獻未墜于地」，所言正同於顧嗣立。然當時袁氏後人祖傳藏書尚存幾何，胡氏並未明言。考明清著述鮮有道及袁氏藏書者，故斷其書籍泰半亡於元末，庶無疑問。

## 七、結語

元代國祚不及百年，科舉久廢，文獻散逸，故學者較少研究元代之私人藏書。顧志興《浙江藏書史》論云：「元代的浙江藏書事業無法與宋、明、清三代相比，只是由於浙江的藏書活動淵源深遠，才未中斷。」<sup>(註 115)</sup>浙人袁桷的藏書始末正好印證了顧氏之見。袁氏乃南宋舊家之後，累世廣蓄書卷，且編有《袁氏新、舊書目》。可惜的是，因其藏書在其身後漸次散逸，兼以書目不傳，藏書情形已難全面了解。本文以袁桷所著《清容居士集》為中心，結合《延祐四明志》及他書的相關內容，簡介袁桷的生平著作及學術思想，管窺其文獻學內涵，並探析袁桷的藏書始末，以見元人藏書實況。

袁桷少即師從戴表元、王應麟、舒岳祥諸名儒。志學之歲，正值宋亡，而元罷科舉。袁桷心存故國之思，又無由問津仕途，遂於史學考據訓練有素。於理學主張會同朱陸，詩風尚三唐，開元人宗唐之風。久居翰林，深受仁宗、英宗器重。袁桷好錄略之學，嘗謂「經以窮理，史以究成敗，廣聞修辭，惟子、集是宜」，於四部書價值之認知，堪稱允當。又精於賞鑑考據，其藏書題跋往往善於發現問題。且於尤袤《遂初堂書目》有所繼承，嘗論及藏書之版本。袁氏少時便曾分彙宋史資料，培養出「體」、「質」並重的觀念。編有《袁氏舊書目》及《袁氏新書目》，系統記錄其家藏書，其體例蓋亦遵循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之四部分類法，惜今已不傳。至於今存袁桷名下之《慶元路先聖廟藏書目》，將詩註置於白文別集之後，不置類書於子部，而列於別集之後，與總集相雜，這些或多或少體現出袁桷圖書分類的觀念。然此目分類之訛誤屢出，而袁氏視而不見，這唯有歸咎於元代目錄學風衰落的大環境了。

115. 同註 108，頁 126-127。



袁桷曾祖袁韶即好聚書，數世以來，典藏豐富。其間雖有散失，然卷帙之搜求，未或中斷。其家書籍之來源，不外手自抄寫、採購、餽贈三途。袁韶曾往南宋中秘抄錄秘笈，爲官二十五年，務在置書，如陳振孫舊藏數十種，皆爲袁氏所獲。至袁桷父袁洪時，家資甚饒，乃克至杭州廣羅佳本；且每延鴻儒入館，師友講習，多得餽贈著作抄本。袁家世仕南宋，宋史資料甚富。元英宗時，丞相拜住擬請袁桷主修宋史，袁桷遂上〈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開列書籍一百五十餘種，多爲翰林國史院所無，其家所藏宋史資料之情況，可知大概。此外，袁桷之藏書頗有珍品。如陸淳《春秋纂例》乃寶章桂氏精校本，李後主詩乃作者手稿，王應麟《困學紀聞》、戴表元文集稿本、鈔本當亦在其所。復次，其於字畫碑帖饒有收藏，題跋亦多。袁氏藏書於袁桷去世後尙由其孫袁曦保存，元惠宗至正初年，曾捐書數千卷以資宋史館修史。至元代末年，兵荒馬亂，袁氏家族衰落，子孫黯弱，藏書多爲婢妾所毀、僕幹所竊，字畫亦多廉售與人，終至所存無幾。袁桷於〈袁氏舊書目序〉中論云：「竊嘗謂天下之物，聚多者終必散。」古往今來，祖傳圖書未能世守者不知凡幾。潘美月先生曾謂私人藏書之散逸，其因有四：一曰燬於兵燹，二曰燬於水火，三曰子孫不肖，四曰書禁之厄。(註 116)可見時代環境變遷於書籍聚散之影響，更爲重大。故袁氏書籍散亡，似不應徒以「子孫不肖」責之。且自南宋紹定四年（1231）袁韶構藏書樓於四明，至元代覆亡（1368），袁氏藏書巋然東南百有餘年，時越兩朝，人更六代；若自世祖混一南北（1279）算起，亦近九十年，與元祚相終始。如此時間跨度，於歷代藏書樓中自非最長，然亦不容忽視。元末孔齊謂袁氏藏書「國朝以來，甲於浙東」。欲考有元一代私人藏書之風，袁桷典藏可謂知味一嚮也。

---

116. 同註 76，頁 23-25。

## 參考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後晉〕劉昫主編，1997，《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
- 〔宋〕歐陽修主編，1997，《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
- 〔宋〕戴表元，1983，《剡源戴先生文集》，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元〕王惲，1983，《秋澗先生大全集》，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元〕孔齊，2001，《至正直記》，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冊6。
- 〔元〕危素，1983，《說學齋稿》，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元〕柳貫，1983，《待制集》，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元〕袁桷，1967，《清容居士集》，臺北：藝文印書館據原刻《百部叢書集成》所收道光郁松年校刊《宜稼堂叢書》本影印。
- ，1983，《清容居士集》，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1983，《延祐四明志》，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元〕陳基，1983，《夷白齋稿》，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元〕徐明善，1983，《芳谷集》，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元〕陸友仁，1983，《研北雜志》，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元〕陶宗儀，1959，《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
- 〔元〕脫脫主編，1997，《宋史》，北京：中華書局。
- 〔元〕黃潛，1983，《文獻集》，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元〕蘇天爵，1983，《滋溪文稿》，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明〕王世貞，1983，《弇州四部稿》，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明〕朱存理，1983，《趙氏鐵網珊瑚》，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明〕汪珂玉，1983，《珊瑚網》，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明〕宋濂主編，1997，《元史》，北京：中華書局。
- 〔明〕張丑，1983，《清河書畫舫》，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明〕張時徹修，1983，《寧波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嘉靖三十七年（1558）刊本影印。
- 〔明〕黃宗羲，1986，《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
- 〔明〕薛應旂修，1983，《浙江通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嘉靖四十年（1561）刊本影印。
- 〔清〕永瑤主編，1965，《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
- 〔清〕全祖望撰、詹海雲校註，2003，《鮚埼亭集校註》，臺北：國立編譯館。
- 〔清〕宗源瀚等修、周學濬等纂，1970，《湖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同治十三年（1874）刊本影印。
- 〔清〕胡文學，1983，《甬上耆舊詩》，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清〕倪燦撰、盧文弨補，1955，《補遼金元藝文志》，載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補編》，北京：中華書局，冊6。
- 〔清〕聖祖皇帝，1983，《御定佩文齋書畫譜》，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清〕錢大昕，1955，《補元史藝文志》，載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冊6。

- 〔清〕戴枚纂，《鄞縣志》，光緒三年（1877）刊本。
-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1996，《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濟南：齊魯書社。
- 〔清〕顧嗣立，1983，《元詩選》，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汪辟疆，1990，《目錄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四版。
- 葉昌熾，1999，《藏書紀事詩（附補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葉德輝，1976，《書林清話》，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據民國九年（1920）刊本影印。
- 錢基博，1993，《中國文學史》，北京：中華書局。

## 二、近人論著

- 王承略、楊錦先，2004，《李燾學行詩文輯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毛昭晰，1999，〈浙江藏書家之精神〉，載黃進國、高躍新主編《中國古代藏書樓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 方建新等，1995，〈中國私家藏書考略〉，載杭州大學古籍所編《古文獻研究》第二輯，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 任繼愈主編，2001，《中國藏書樓》，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 何廣棧，2008，〈明清學者補《元史藝文志》考〉，《新亞學報》，第26卷，頁1-36。
- 昌彼得、潘美月，1986，《中國目錄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 孫瑜，〈袁桷的學術傳承、政治生涯及社會網路——元中期南士境遇之管窺〉，載dean.pku.edu.cn/bksky/2000tzwj/13.doc。
- 張紅，2006，《元代唐詩學研究》，長沙：岳麓書社。
- 傅璇琮、謝灼華主編，2001，《中國藏書通史》，寧波：寧波出版社。
- 楊亮，2006，〈袁桷生平、學術淵源及心路〉，《殷都學刊》，第2期，頁58-61。
- 楊立誠、金步瀛編，1971，《中國藏書家考略》，臺北：文海出版社。
- 雒竹筠、李新乾，1999，《元史藝文志輯本》，北京：燕山出版社。
- 潘美月，1980，《宋代藏書家考》，臺北：學海出版社。
- 鄧洪波，1996，〈元代書院的藏書事業〉，《圖書館》，第4期，頁69-71。
- ，1999，〈元代書院藏書研究〉，《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頁4-11。
- 顧志興，1987，《浙江藏書家藏書樓》，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2007，《浙江藏書史》，杭州：杭州出版社。
- 顧易生、蔣凡、劉明今，1996，《宋金元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On Yuan Jue and His History of Book Collection

Nicholas L. Chan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Fo Guang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duration of the Yuan dynasty (1279-1368) was less than one century, and the history of book-collecting in this period has seldom been studied by scholars. A descendant of a politically influential family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1127-1279), Yuan Jue (1266-1327) was a notable book-collector and the compiler of two bibliographies, *Yuan Shi Jiu Shu Mu* and *Yuan Shi Xin Shu Mu*. Since Yuan Jue's book collection gradually disappeared after his death and his bibliographies are no longer extant, it is difficult to gain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his book-collecting. Focusing on the related materials in Yuan Jue's *Qing Rong Ju Shi Ji* and *Yan You Si Ming Zhi*, as well as other classical work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Yuan Jue's life and philosophy, probes his ideas of documentology, and investigates the history of his book collection. This will allow us to increase our understanding of book-collecting in the Yuan Dynasty.

Yuan Jue was a famous historian. He maintained a neutral stance toward neo-Confucianism, and he encouraged people to learn from the Tang poetry for creative writing. He was also interested in bibliographical study and was a connoisseur of ancient books. In his childhood, he started to gather and classify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Song Dynasty. Since the time of Yuan Shao, the great-grandfather of Yuan Jue, the Yuan family had been collecting books. The books were obtained by copying, purchasing and receiving as gifts. After the death of Yuan Jue, the books were kept by his grandson Yuan Yan, who later donated thousands of volumes for the government's compil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Unfortunately, the peasant rebellions in the late Yuan Dynasty caused the decline of the Yuan family, and the loss of the book collection as well. The books were either destroyed by maids or stolen by servants. Nevertheless, it is

remarkable that six generations of the Yuan family kept the books for over a hundred years. Yuan Jue's book collection was the most famous one in Zhejiang Province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and examining it is a good way to study the conditions of book-collecting in this period.

**Key words:** Yuan Jue, book collection, Yuan Dynasty culture ,  
documentology, Zhejiang Province

(收稿日期：2007.11.8；修正稿日期：2008.1.10；通過刊登日期：2008.4.11)